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 资料选编 (1925—1945)

第一辑

崔 丕 姚玉民 译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0624.3
2011.3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华人中心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 资料选编

(1925—1945)

第一辑

崔 丕 姚玉民 译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 (1925—1945): 第一辑/崔丕, 姚玉民译.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361 - 4022 - 6

I. ①日… II. ①崔… ②姚… III. ①华侨 - 史料 - 1925—1945
IV. ①D63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26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3335

网址: www.gdgjs.com.cn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5 字数: 560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65.00 元

出版说明

本课题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年度重大项目 (08JJD810157) 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2007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07GI02) 的资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暨南大学“211 工程”第 3 期建设项目 (“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 的资助。

出版说明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共出版三辑。本丛书译自2003年日本龙溪书舍整理出版的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在我国属第一次出版。

正如译者在《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见总序）所言：“1907年，日本政府批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从此，日本政府有关机构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等一批‘国策会社’开始对南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直到日本帝国崩溃才戛然而止。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调查报告资料，对于研究南洋华侨史乃至中日关系史和太平洋战争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亟待我国学术界的整理与研究。”因此我们相信，这套史料的出版，对我国史学界进一步了解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调查的历史真相，开拓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本丛书是1925—1945年期间日本政府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资料，其中的某些用语和措辞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特别是调查者提出的政策建议部分，使用“皇军”、“台湾本岛人”、“我方”等称谓，再如某些镇压华侨的政策建议。为了保持历史档案原貌，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对书中观点和称谓不以现在的提法和措辞加以替代。

另外，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当时调查、编写者水平所限，调查资料中存在一些不准确、不完备之处。此类问题无法亦不必以现今图书出版规范加以修正，为免繁琐，我们亦不在文中一一加注说明。敬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加以注意，慎重取舍。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2月

总序

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 (1925—1945)

纪宗安 崔丕

内容提要 本文以2003年日本整理出版的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为中心,探讨20世纪上半期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特殊背景与政治目的、调查方法与调查事项、政策建议及其对日本政府重要决策的影响。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是日本军国主义“南进”政策发展的产物。“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及其政策建议表明,这一长期而庞大的调查行动又是以要解决日本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面临的深刻矛盾为中心而展开的。“南洋华侨调查”不仅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南洋华侨政策、对华政策、对东南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参考资料,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府的重要决策。开展关于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问题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日本 南洋 华侨

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同时,日本也面临着是建立“大陆帝国”还是“海洋帝国”的抉择。1907年,日本政府批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从此,日本政府有关机构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等一批“国策会社”开始对南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直到日

本帝国崩溃才戛然而止。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调查报告资料^①，对于研究南洋华侨史乃至中日关系史和太平洋战争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亟待我国学术界的整理与研究。本文以近年来日本龙溪书舍出版的《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重要研究资料(3)》中收录的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资料为中心，着重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对南洋华侨的调查与日本军国主义“南进”政策的关系。其二，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对南洋华侨调查的范围、调查方法、主要事项、主要结论。其三，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关于南洋华侨调查所提出的种种政策建

① 本文使用的各种日文图书资料，凡是引自同一种丛书或者文集内的调查报告书以及论文，只注明该丛书或文集的名称。根据台湾“国史馆”与日本中京大学联合整理的《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第1~5卷，东京ゆまに书房，1993—1998年出版)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陈列馆整理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文书目录》(2002年编印)的不完全统计，日俄战争以后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和国策会调查机构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资料多达400余种。其中，长篇调查报告书达100余种，短篇调查报告书达300余种。1968年以来，日本陆续公开这批调查报告资料，先后在《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出版)、《现代史资料》(三岭书房出版)、《南方史料丛书》(青史社出版)、《南方军政关系史料》和《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重要研究资料》(龙溪书舍出版)等大型历史文献中集中公布，总计达200余种。根据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宪政资料研究中心提供给暨南大学的特藏文献目录，还有相当一批调查报告资料没有进行整理。中国学术界关于南洋华侨的研究，历来重视阐明南洋华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包括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关系、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其文献学基础大体上立足于中国历史档案、南洋华侨社团所办各种中文报刊资料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著。参阅：曾瑞炎：《民国时期华侨史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第383~4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李安山：《中华民国时期华侨研究评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以来陆续出版；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国策会满铁公司和满铁公司调查部的过程中也只是简单地介绍其对南洋军政的调查活动。参阅：苏崇民：《满铁史》，上海：中华书局，1990年；解学诗：《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台湾的学者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注意到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关于南洋华侨调查报告书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也只是对这批文献资料进行选编选译。在杨建成主编的《南洋研究史料丛刊》(中华学院南洋研究所，1983—1986年印行)中，收录了13种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和满铁调查部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关于南洋的研究，是同日本政府及殖民机构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在同日本的强行侵略的历史同步并紧密结合中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域研究”模式影响着日本学术界的东南亚研究。与南洋华侨研究相比，日本学术界更加重视阐明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过程，以究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更加重视阐明日本在东南亚占领区军政制度的形态与性质，以究明“帝国统治”与战后东南亚非殖民化进程的内在联系。在南洋华侨研究本身，日本学者注重“比较史研究”和“亚洲史研究中的华侨史研究”。参阅：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劲草书房，1984年；早濑晋三：《岩波讲座·东南亚史·东南亚研究案内》，岩波书店，2003年；滨下武志：《华侨华人研究的展望》，见饭岛涉编：《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现状》，汲古书院，1999年。

议,究竟怎样影响着日本政府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决策。我们期待,通过这项研究,阐明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调查的历史真相,开拓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

一、日本帝国的南进政策与对南洋华侨的调查

日本政府重视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思想界就出现了关于“海外雄飞”的扩张主义思潮,提出了日本民力向南洋扩张的课题。^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割占中国台湾,为其“南进”奠定了现实基础。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半部的特殊地位。这样,围绕着日本帝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日本陆军部和日本海军部分别提出了建立“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战略方针。在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陆军部主导下,190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明确提出了日本将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地区发展的基本国策^②,暂时平息了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的争论。在这以后,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动和日本国内权力格局的变化,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方向偏重于“北进”。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日本吞并朝鲜、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特权地位、夺取德国在中国胶州半岛的权益、出兵占领俄属东西伯利亚地区。“南进”在日本对外扩张政策中暂时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行径,激起了南洋华侨的抵制日货和抗日运动。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指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和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作为“南方研究情报机构”,负责对南洋(东南亚)各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条件作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③

日军出兵俄属远东西伯利亚,是日本“北进”扩张政策发展的重要转

①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第93~94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 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675~698页,原书房,1967年。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第12~13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③ 苏崇民:《满铁史》,第778~8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该书概括介绍了满铁调查部作为日本国策调查机关的活动。解学诗的《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目前国内比较全面研究满铁调查部的著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的专门研究著作。有关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的各种情报收集和调查活动,除了从《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进行检索以外,还可以参阅日本学者加藤圣文主编的《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ゆまに书房,2006年出版)。该书收录了1937年9月以来至1942年9月的154期部报,共计13卷。《别卷》收录总目次和主编者的解題。

折点。^①从此,日本军国主义集中力量攫取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权益。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激化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一,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在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中,南洋华侨的救国捐款、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投资、购买国债等豪举,有力地支撑着战时中国财政。国共两党重新联合起来,整个中华民族浴血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期内征服中国的计划破产。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发展态势,迫使日本政府慎重处理对苏政策,牵制着日本与纳粹德国的战略呼应。其二,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加强对华军事援助的力度。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逐渐扩大对日战略物资禁运的范围,断绝日本从西方国家获得战略物资补给的途径。这样,日本要赢得中日战争就必须夺取美国、英国控制的南洋地区的战略资源,而这又意味着日本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对抗。可以说,中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北进”与“南进”的合流。^②1939年6月21日,兴亚院、大藏省、陆军部、海军部、拓殖省、商工省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对华侨工作统制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了断绝南洋华侨与中国国民政府的联系,使华侨的经济力量为新政权控制地区建设服务,日本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措施。^③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对南洋华侨的调查,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除满铁调查部和台湾总督府外事部这两个机构继续从事南洋华侨调查以外,三井物产这类的财阀组织以及从满铁调查部分离出来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和“兴中公司”也加入其中。^④日本政府每年拨付300万日元专项经费,资助关于包括南洋华侨调查在内的

① 细谷千博:《俄国革命与日本》,原书房,1972年。小林幸男:《日苏政治外交史》,原书房,1980年。

② 关于日本政府“北进”政策与“南进”政策的关系问题、资源问题在“南进”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参阅:森山优:《南进论与北进论》,《岩波讲座·亚洲太平洋战争》,第7卷,第189~220页,岩波书店,2006年。

③ 樋口秀実:《从日本海军所见的日中关系史研究》,第241页,芙蓉书房,2002年。有关兴亚院与战时中国调查问题,参阅:本庄比佐子:《兴亚院与战时中国调查》,岩波书店,2002年。

④ 解学诗:《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第373~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为制定全东亚建设方策必须对全东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实行科学的综合的研究”作为理由,以满铁调查机关是日本在大陆开拓方面有调查经验和广泛组织的唯一机构这种条件,要求扩大成为国策调查机关。经过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同意,满铁扩大了调查部。在扩大以后的调查部内,上海调查室“以中国的重建及日满华综合体制为目标,开展关于华中、华南及其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东亚经济调查局的任务是开展“关于同建立日满华集团有关的南洋及除中国外的东南亚的调查研究”。

“南方圈调查”^①。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从1929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南洋年鉴》。1937—1941年期间，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满铁调查部公开刊印了两套分别讨论越南、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华侨的专集《南洋丛书》和《南洋华侨丛书》，共计11种^②，以唤起整个日本社会对南洋华侨问题的关注。

1940年7月27日，日本帝国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随着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对南方问题”^③。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陆军部再次提出乘机“北进”。1941年7月2日，御前会议批准《随形势推移帝国国策要纲》，决定秘密准备对苏战争。但是，日军发现，驻守在远东地区的苏联红军并非如日本预计的那样大规模地迅速向欧俄地区调动，如果日军一味增加兵力备战，恐怕引火烧身。于是，“北进”论者再次妥协。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对美国（英国、荷兰）的战争准备。^④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能否获得南洋华侨的合作与支持就成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重要课题。^⑤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达到鼎盛。首先，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将南洋华侨调查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25年，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实地巡视南洋各地华侨与南洋的关系以后还只是强调指出：“中国问题最近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问题，不仅应该从中国内地观察中国问题，而且还应该从中国人发展的海外观察中国问题。特别是在像南洋这样的中国人与欧美列强交错的地方进行调查

① 杨建成主编：《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四集·南洋抗日救国运动始末》，第225页，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印行，1983年。

② 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第462~463页，劲草书房，1984年。《南洋丛书》中收录5种调查报告，没有作者个人署名，而是以“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员共同”的名义署名，篇名、出版时间和篇幅如下：《荷领东印度篇》（1937年，506页），《法领印度支那篇》（1937年，400页），《英领马来篇》（1938年，350页），《泰国篇》（1938年，630页），《菲律宾篇》（1939年，560页）。《南洋华侨丛书》中收录6种调查报告，作者个人署名，作者、篇名、出版时间和篇幅如下：宫原义登：《泰国华侨》（1939年，350页），衫山成显·山川寿：《法领印度支那华侨》（1939年，320页），井出季和太：《菲律宾华侨》（1939年，200页），岩隈博等：《荷领印度华侨》（1940年，500页），井出季和太：《英领马来缅甸及澳洲华侨》（1941年，250页），陈达著、雪竹荣译：《南洋华侨与福建广东社会》（1939年，330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437~438页，原书房，1969年。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544页，原书房，1969年。

⑤ 高桥三吉：《话说南方共荣圈》，第204页，讲谈社，1941年。当时，作者任兴亚同盟副总裁，系预备役海军大将。

研究，是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忽视的。”^①而今，在情报局编写的《南洋华侨概观》（昭和十七年，1942）中，编者已经直言不讳地说：“南方建设之际，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正在成为南洋经济重大要素的华侨的存在。不了解华侨，就不能解决南方问题。”^②其次，更加注重选择与战争直接相关事项的调查。例如：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调查、南洋华侨侨汇与战时中国经济关系调查、南洋华侨领袖调查、南洋华侨群体内部关系调查，等等。再次，在参与南洋华侨调查的机构中，各种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特别是占领东南亚的日本军政当局直接进行调查。波集团司令部对南洋华侨侨汇的调查，就是最典型的例证。^③

澄清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对南洋华侨调查的背景和目的，乃是洞察这种调查活动内情与实质的金钥匙。我们完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南洋华侨历史与现状的调查，是日本帝国“南进”政策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面临的深刻矛盾所展开的“国策研究”。这一性质，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否认的。

二、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与政策建议

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而言，《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显示，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最早的“南洋华侨调查报告”，可以追溯到1914年（大正三年）台湾总督府指令台湾银行进行的“南洋华侨侨汇调查”^④。《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研究重要资料（3）》中《南洋华侨篇》收录的这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日本政府及殖民机构在1925—1944年期间的调查情况。即使是在这个范围以内，从直接参与南洋华侨调查者的属性上看，可以划分成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日本政府机构。其中包

① 满铁庶务部调查科：《在南洋的中国人》，第1页，大正十五年（1926年）六月十五日。《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研究重要资料（3）》，第57卷。该书编辑的体例是按照收录的调查报告的页码编排，而无全书的统一页码。

② 情报局：《南洋华侨概观》，序言。《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重要研究资料（3）》，第58卷。

③ 《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研究重要资料（3）》，第53卷。

④ 该调查报告的撰写者曾经在广东和福建侨乡进行实地调查，对南洋华侨移民的背景、方式、有关组织、薪资报酬、侨汇流通进行分析研究。该调查报告书的中译本被收入杨建成主编的《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十五集·侨汇流通之研究》，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印行，共计140页。

《20 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研究重要资料（3）》中的
南洋华侨调查报告书目录^①

调查机构名称	调查事项与调查报告名称	调查时间	备注
台湾总督府官 房外务部	南洋华侨状况	1938 年 11 月 23 日	152 页
满铁上海事务 所调查室	华侨调查汇报, 第 1 辑	1940 年 8 月 15 日	254 页
通信调查会	关于南洋印度等地华人抵制日货 情况的报告	1939 年 7 月 30 日	85 页
东亚研究所第 三调查委员会	南洋华侨调查结果概要	1941 年 10 月 5 日	61 页
台湾拓殖株式 会社	南洋华侨及其对策	1942 年 10 月	169 页
拓务局南洋科	中国事变期间南洋华侨的动向及 其影响	1938 年 2 月	56 页
满铁总裁室情 报科	英属马来亚华侨的反日运动现状 及其前景	1939 年 1 月	47 页
台湾拓殖株式 会社调查科	中国事变与华侨, 上下编	1939 年 12 月 29 日	216 页
印支派遣军司 令部	法属印度支那华侨工作方案	1941 年 6 月 27 日	15 页

① 龙溪书舍出版的《20 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研究重要资料（3）》这部大型文献资料集, 共 69 卷。其中, 第 50~64 卷是《南洋华侨篇》。除此之外, 同书第 1~11 卷《政治篇》内收录了《南洋厅十年史》(1932 年)、《中国、南洋抵制日货》(1929 年) 这两种调查报告。第 12~21 卷《经济篇》内收录了《南洋关系会社要览》(1939 年)、《荷属东印度产业》(1937 年)、《马来及昭南岛》(1942 年)、《英属马来经济》(1927 年)、《中国战时财政》(1939 年)、《南洋五十年》(1937 年, 上下)、《南洋与日本人社》(1937 年)、《日本在南洋的投资》(1928 年) 等 8 种调查报告书。第 22~31 卷《社会一般及综合调查篇》内收录了《南洋协会十年史》(1925 年)、《大南洋年鉴》(1942 年)、《苏门答腊研究》(1943 年)、《英属北婆罗洲地方事情》(1934—1939 年)、《南洋群岛调查资料》(1927 年)、《南洋总览》(1927 年) 等 6 种综合调查资料。第 38~49 卷《南洋经济篇》内收录了 30 余种关于南洋资源的调查报告书。第 65~69 卷《南洋协会篇》内收录了《南洋协会二十年史》(1935 年)、《南洋经济恳谈会报告书》(1941 年)、《昭南日本学园》等 3 种调查报告。

续上表

调查机构名称	调查事项与调查报告名称	调查时间	备注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	大东亚战争对内地的影响·第三部：华侨	1942年4月	19页
井村熏雄著	列强在华投资与华侨侨汇	1940年10月15日	委托调查，232页
波集团军司令部	对华侨侨汇总额的评估及吸引华侨侨汇的对策	1941年12月5日	112页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	战时中国经济与华侨侨汇	1942年11月25日	110页
驻上海大使馆特别调查科	重庆的战时国债与华侨侨汇	1943年2月20日	28页
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福建华侨侨汇，另附统计图表39幅。根据福建省政府秘书处郑林宽的报告翻译	1943年3月4日	212页
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华侨	1925年12月1日	218页
日华实业协会	华侨经济（刘士木发表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编撰的《中国经济年鉴》上的论文）	1934年12月20日	46页，译文
东亚经济调查局	华侨阻碍我国南洋贸易的真相	1932年7月14日	92页
小林新作	华侨之研究	1931年10月23日	委托调查，342页
满铁庶务部调查科	在南洋的中国人	1925年6月15日	34页
通商局第二科	华侨的现状	1935年6月	128页
兴中公司	南洋华侨之研究	1937年5月10日	200页
兴亚院政务部	南洋华侨（1）、（2）	1939年3月	123页
山崎清三译	现代华侨问题（丘泽平著）	1939年5月12日	译文，196页

续上表

调查机构名称	调查事项与调查报告名称	调查时间	备注
情报局	南洋华侨概观	1942 年	66 页
外务省欧亚局第三科	南洋与华侨（译自南洋商报社编辑的《南洋年鉴》）	1939 年 9 月	406 页
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	南洋华侨调查，第 1 辑	1939 年 7 月 20 日	221 页
东亚研究所	南洋华侨	1939 年 9 月 27 日	23 页
东洋协会调查部	当前华侨概观	1940 年 6 月	118 页
北泽宥胜	南方圈的华侨——我国损害保险业的扩展及与华侨的接触	1942 年 7 月	42 页
台湾总督府外事部	南方华侨领袖名簿	1942 年 9 月 10 日	99 页
台湾总督府外事部	南方华侨团体调查	1943 年 3 月	156 页
天田六郎 著	暹罗华侨现状	1929 年	184 页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暹罗室	暹罗华侨的动向	1938 年 10 月	45 页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暹罗室	暹罗中华总商会规约及职员名簿	1939 年 2 月	14 页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调查科	泰国华侨	1939 年 11 月	45 页
华南银行新加坡支行	关于华侨的有关情报	1938 年 5 月 9 日	21 页
南中国调查会	马来亚华侨	1939 年 5 月	10 页
华南银行新加坡支行	反日华侨与新加坡	1939 年 1 月 31 日	33 页
南中国调查会	华侨领袖名簿	1939 年 1 月	28 页

续上表

调查机构名称	调查事项与调查报告名称	调查时间	备注
南中国调查会	马来亚华侨团体	1939 年 1 月	28 页
台湾总督府官房外事科	英属马来亚与华侨	1938 年	64 页
台湾银行广东支行	华侨（广东省）	1933 年 3 月 15 日	65 页
兴亚院厦门联络部	福建华侨经济	1940 年 12 月	108 页
东亚经济恳谈会	爪哇华侨的近况	1944 年 3 月	32 页
台湾银行驻巴达维亚代表	巴达维亚华侨调查	1939 年 1 月	60 页
台湾银行驻巴达维亚代表	缅甸华侨	1939 年 1 月	42 页
纺织品输出振兴株式会社规划部	菲律宾华侨概观	1942 年 6 月	182 页

括陆军部、海军部、外务省、大东亚省、兴亚院、日本驻台湾总督府、东南亚派遣军司令部、波集团司令部等。第二类是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这样的“国策会社”。第三类是像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这样的财阀组织。第四类是像东亚研究所这样的“国策调查”研究机构。从南洋华侨调查范围来看，凡是与南洋华侨的历史和现状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等，无不在调查之列。倘若从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来看，日本政府及殖民机构最重视的莫过于南洋华侨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调查、战时中国经济与南洋侨汇关系调查、南洋华侨侨领及社团调查、南洋华侨资本状况调查、南洋华侨与南洋其他种族关系调查、南洋各国对华侨政策调查等课题。从调查方法与资料特色方面来看，包括综合调查、专题调查、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委托学者调查等多种类型。其中，在文献调查这一方面，既包括在利用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的调查研究，也包括直接翻译中文或外文文献资料。像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提交的《福建华侨侨汇》、《现代华侨问题》、《福建华侨经济》这三种调查报告，

都是由中文直接翻译而成的。像外务省欧亚局第三科提交的《南洋与华侨》，则是将南洋商报社编辑的《南洋年鉴》有关专栏文章直接翻译过来。像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提交的《南洋华侨调查》（第1辑），是将美国、英国、荷兰等国杂志上刊载的关于华侨研究的论文翻译成为日文。在“委托学者调查”这一方面，井村熏雄的《列强在华投资与华侨侨汇》、小林新作的《华侨之研究》，都是非常典型的。前者是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委托，后者则将其真实背景隐藏起来，只在其书序言中说明“昭和四年四月曾在某省内印刷”^①。这里所说的“某省”，不外乎是日本国家中央官厅中的“外务省”或者“陆军省”之类。在“实地调查”这一类型中，既有短期调查后提出的调查报告，像国际电气通信株式会社《关于南洋印度等地华人抵制日货情况的报告》；也有利用长期生活或任职于南洋者完成的调查报告，例如《华侨阻碍我国南洋贸易的真相》的作者竹井十郎，就是著名的“南洋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调查报告是文献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产物。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提交的《南洋华侨领袖名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份调查报告，最初是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1939年6月编印的“绝密”工作手册，长达553页，共计8164条，汇集了当时香港、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九个地区华侨领导人士的姓名、学校、会馆、社团、商号的名衔和地址，并且预留“备考栏”，提供占领军或情报人员实地考察添注之用。^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1月，曾经根据新的调查资料予以修订。现在的调查报告版本，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再次修订的版本。但是，其篇幅已经缩减到99页。^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政府及殖民机构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其调查规模之大，调查持续时间之长，调查内容之全面，都是世所罕见的。下面，我们就以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抗日运动调查、南洋侨汇问题调查、南洋华侨侨领与社团调查、南洋华侨群体关系调查为中心，具体而细微地剖析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调查的历史真相。

① 小林新作：《华侨之研究》，序言。《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重要研究资料（3）》，第56卷。

② 杨建成主编：《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一集·三十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重刊者引言”，第1页，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重刊，1983年。

③ 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南方华侨领袖名簿》，1942年9月10日。《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关系重要研究资料（3）》，第61卷。

（一）关于南洋华侨抵制日货和抗日救国运动的调查^①

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斗争，出现于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不仅直接影响中日战争的局势和进程，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命运。因此，关于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调查，被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1941年10月5日，东亚研究所第三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南洋华侨调查结果概要》，由《南洋华侨发展史调查》、《南洋华侨经济状况调查》、《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调查》这三个专项调查报告构成。其中，在《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调查》部分，调查者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划分成为3个发展阶段和12个具体层面，依次分析了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在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陷落这一阶段，调查者从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救国捐款、购买公债、回国服务等五个方面展开调查与分析，认为：“抗日宣传是以反法西斯、反侵略主义思想为背景的。特别是路透社、中央电讯社的宣传报道，在华侨中间酿成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分子在爱国的名义下组织起来众多的秘密团体，唆使这些组织进行纠察、监视、制裁活动，强制华侨各业团体、被日本企业雇佣的华侨，甚至是一般华侨抵制日货。这种抵制日货活动，不仅包括拒绝贩卖日货、消费日货、运输日货，而且还扩大到与日本各行各业的各种交易、在日资矿山的罢工活动。”“捐款最初主要是在侨民大会和各种纪念日进行，大部分是各华侨团体和华侨富商的捐款。南京事变前后，成为华侨各阶层普遍性和持续性的活动，即常月捐制度。”“救国公债主要是华侨资本家、各种华侨团体购买。”在“回国服务”方面，“热血青年回国参加抗日组织或从军，在荷属东印度、马来亚、菲律宾、缅甸组织华侨救国队，参加华中、华南的战场救护”。在从广州、武汉陷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这一阶段，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抗日宣传和救国捐款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南洋华侨的救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动向。例如，华侨资本向中国西南地区投资、组织南洋技工团回国服务（1939年，从英属马来亚回国服务者有3 192人）、开展“救乡运动”^②，等等。“这一时期南洋各地的抗日

^① 在杨建成主编的《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四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中，只收录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上海调查所1940年5月完成的调查报告《华侨调查第一辑·国民党政府在七七事变后的华侨工作》，共88页，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

^② 救乡运动：南洋各地同乡团体相互联络，组织救乡团体，致力于寻求经过香港的汇款、通信、出入国对策。特别是建立救乡服务团，与福建、广东两政府军队和家乡的民团合作，在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的偏僻地区保持联络。